

北京图书馆参考工作

(资料汇编)

第 二 辑

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

1984年3月

目 录

书目工作

- 《1911—1949全国中文图书总目》概况
和编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王润华 (1)

工作总结与工作方法

-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工作总结…… (11)
西文期刊联合目录工作浅谈……王大方 程 真 (17)
关于文献检索终端的对话……………潘岩铭 王春英 (29)

咨询与资料

- 往事与寄望……………龙顺宜 (40)
这是我们的光荣责任……………林 宪 (54)
兰溪栖真教院及藏书……………邢淑贤 (57)
国外大学情况资料简介……………刘克俊 (60)
介绍美国行为医学会及《行为医学文摘》
……………聂 平 (65)

外国图书馆参考工作

- 访菲观感……………戚志芬 (69)
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情报书目部工作动态: 1979
……………李以娣 (77)

外国图书馆学词典词条选译

- 参考服务与图书馆……………马龙璧译 (82)
参考工作……………肖宏菟译 (91)

工具书介绍

- 科技工具书简介 (五种)
……………陆兰天 叶慧娟 吴加燕 刘克俊 (96)

《1911—1949全国中文图书总目》概况 和编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王润华 执笔

编者按：本文是王润华同志代表北图参考研究部书目组在“全国目录学专题学术讨论会”（1983年8月，沈阳）上所做的发言。有关编制《1911—1949全国中文图书总目》的许多问题，今后仍需不断总结经验，认真研究，欢迎馆内外同志们提出意见和建议，我们今后还将陆续发表一些这方面的材料。

《1911—1949全国中文图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是一部大型回溯性书目。它收录我国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所出版的中文图书。资料来源主要是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以及国内其他图书馆的有关藏书。在这个时期内，全国出版的中文图书估计在十万种以上。《总目》计划以学科分册，陆续编辑、出版。

《总目》的编辑工作始于1978年9月，当时除了集中本馆所藏有关图书的卡片外，还集中了上海、重庆两馆所藏有关图书的卡片和资料。北图的卡片分属于两个编目系统，再

加上海、重庆两部分，实际上是四套片子汇合。四套原始片子的著录要求很不一致，不可能仅就片子上各不相同的著录项目作相互补充就能符合新的著录要求。所以凡是北图有藏的，逐本作了重新核对和补充，北图缺藏的则需要分头去上海、重庆重新看书核校原片。这就是进行工作时具备的基础条件。

顺便说一下上海、重庆两套片子的由来。重庆片是根据四川省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编印的两册《抗战时期出版图书联合目录》剪贴而成的，上海片则还有一段历史经过。

六十年代初，出版事业管理局认为有必要汇编一本解放前的出版物总目，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版本图书馆。因为上海在解放前一直是国内文化出版中心，所以选定以上海图书馆的藏书作基础，然后再进行查漏补缺。1960年夏天，版本图书馆派人去上海图书馆开始进行这项工作，除得到上海图书馆支持和帮助外，在人力方面还得到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的很大支持。到1962年底止，把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解放前中文平装图书制成了一套分类片子，总计约九万种。此后，版本图书馆的人员撤回，由出版文献所就上海地区（如中华书局图书馆）继续进行查补，并将整套分类片另抄了一份改排成书名片。后因“文化大革命”，工作就停顿了。

1973年夏，经国务院出版口和上海市出版行政机关批准，把分存在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辞海编辑所的两套片子交给北京图书馆，续继完成此项编目工作。

我们在四套片子的基础上着手工作。由于工程浩大，采用以学科大类逐类核校、汇编，分册交付出版的办法来进行这项工作。至1982年底止，已经编就初稿的有“语言文字”、“外国文学”两类，正在核校、汇编中的有“中国文

学”、“文学理论”、“艺术”等三类。哲学、史地、经济、法律、科技等几类均已开始核对和汇编。争取在1985年以前完成文、史、哲以及社会科学中其他几个条件比较成熟的类的汇编定稿工作。

在过去的工作过程中遇到过不少具体的困难、走了一些弯路，其中有的问题已初步得到解决，但有的解决得并不很理想，今后如能开创新的条件，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解决，有的则已成定局难以更改了。综述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 关于收书要齐全的问题

作为一本回溯性的总目，收书齐全当然是最基本的要求。一开始我们也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发现，原先的若干设想难以办到。有的即使能办到，但所投入人力与实际收效之间得不偿失，而且使整个工作进度为之拖延。以全国图书馆所藏的有关图书来讲，比我们现在手上已经收集到的北京、上海、重庆三个馆的馆藏，当然要丰富得多，不少正是我们要查漏补缺的对象。但这是一项细致、量大的工作，为了争取时间，我们决定将手上已经收集到的资料先行汇编出版，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动图书馆界更广泛的力量来进行查补，出版“补编”。

至于我们已经收集起来的资料，其齐全程度究竟如何，曾分别以出书单位与几个类别，进行了抽样性核对。其结果是，已收集到的图书数量占该时期出版图书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鉴于到几个兄弟馆查补的实际收效与对已经收集的资料的齐全程度的摸底，我们对《总目》收书齐全这一目标有了比较接近实际的一致看法，从而我们把主要精力由查漏补缺逐渐转移到汇总编排方面来。

已经集中的资料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不足，就是在这段时期内出版的线装书没有收集进来。其原因，主要是国内许多图书馆的线装书从采访、入藏以及分类、编目等各个环节多是自成一个独立系统。因此如要将这部分线装书也予收编，好多工作得另起炉灶，要投进去许多人力和时间。此外，要将这些线装书用统一的分类法揉进一般图书里会发生许多具体困难。对真正需要查阅这些线装书的读者来讲，揉合在一起未必便于他们使用。与此情况相似，兄弟民族文字图书也没有收进来。但是这两部分资料作为一本总目来讲是不可缺少的，计划以后将之汇编、出版《总目》的专门分册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从是否能收编的角度来逐一核实，有一部分是需要删剔的。对超出规定出书年份的书比较好办，有明确的上下年限，但是对超上限的如何处理就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应该遵守这个上限，有的则认为辛亥革命以前出版的这些图书是我国现代出版物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建国后有版本图书馆逐年编印的《全国总书目》，前清皇朝则修订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现在既然在为这一段补空白，结果还是留着一小块不填补，很可惜。建议把收书年限从1911年辛亥革命往前放宽。但问题是放宽上限应上推到何年为合适呢？最后商定，收书年限不变，凡是超上限的资料、卡片，另行集中，今后与其他一些必须剔出而又有参考价值的图书汇合起来，作为《总目》的一种附录，或者另起一个能确切

反映这部分图书的标题，另行汇编、出版。

除年限以外尚需作删剔的图书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外国出版的中文图书（包括华侨在国外用中文出版、发行的图书）；二、外国驻华使、领馆印行的中文图书（不包括外国在华的文化团体、经济社团以及宗教团体所出版的中文图书）；三、稿本、手抄本、报刊资料剪贴本等。油印本基本上也不予收编，但如遇油印的正式出版物或一套书里的某一分册，则可视需要酌予收编；四、因政治原因而不便收录的图书。这是指若干在书名、编著者项内存在明显的对党、对人民政权进行污蔑、谩骂或者对反动头子有颂扬性词句的一些图书。

（二）关于择定分类法的问题

我们手上所掌握的最基本的两大块材料是北图和上图的藏书。根据这些藏书所做的片子都把原来的刘国钧分类号过录了过来，个别需要重新定类的也给了刘国钧分类号。也就是说，在正式汇编之前的原始片子是以刘国钧分类体系排列的。有人主张凑现成，认为旧书用老分类法来分是驾轻就熟，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有的主张既然《中图法》已经问世、推行，就应该用《中图法》来汇编《总目》，并且提出，改用分类法并不需要彻底推翻原来所给的类号逐本重新分类，只是一个一个小类重新组合就行。后者的意见最后被采纳了。但是在实际编排过程中又出现了问题，许多根据具体收书归纳出来的题目（标题）找不出合适的地位来安置，于是只好突破原来的体系重新编排。以已经初步定稿的“语

言文字”类为例，一共设了不同级别的类目183个，其中有占半数在原分类法所没有的或者已将具体标题作了一点更改的；至于编排的先后次序、从属关系等，则更是作了较大的变动。这方面的工作，包括需要向馆内外有关的专业人员征询意见并研究这些意见，所投进去的精力，占整个汇编工作的比重是不小的。在今后其他几个类别的汇编中，这样性质的问题一定还会不断发生，如对地理书籍是否按规定分为人文、自然两部分，心理学是否从哲学移至自然科学之下等等新问题，在工作过程中一定会形成不同的意见，而需要事先统一认识的。

目前我们对分类体系问题只作了一个比较原则的规定，《总目》的分类体系原则上依据《中图法》，特别是一、二两级大类目尽可能保持原来的体系，但必要时也可以根据实际所收编的图书自行设置类目，或者将原标题所用的文字、所规定的涵义略作变动。如A大类马列主义，如不缩小收书范围，将之改标为马列著作的话，许多解放前的旧书就难以处理。

(三) 关于汇编、排列方面的问题

《总目》是一本以分类汇编的书目，因为收书量大，往往在一个不可再分割的细目之下还有大量的图书要容纳，于是就出现了如何排列的问题。我们从几个方案中选定了以图书出版时间先后来排列，这样可以体现出某一个学科（或者只是某一个小类）在国内传播和发展的脉络。这个办法当然也有不足之处，象有连续性的图书、同一个作者的同一学科的著

作等就拆散了。为了弥补不足，相应作了些规定，如在同一小标题之下，同一作者先后出版的作品要相应靠拢，即使是不同编者的连续性图书，象《古史辨》开始由顾颉刚所编，后几册由罗根泽、童书业所编，在汇编时也要靠拢。在文艺作品部分，则在同一标题之下同作者的不同集子靠拢之后，又以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音序先后作了排列（外国文学作品在分国之后以姓名原文的字母先后排列）。对所用的不同笔名则作了适当的照顾，只是将一些通常能了解到的笔名、所署的不同名号和仅仅是署名时挂姓或不挂姓的不同等作了相应的靠拢。我们不打算在笔名问题上花费大量的精力，抱着宁漏勿错的精神处理了这个问题。

其次是互见问题。按学术体系来类分图书，需要互见是必然的，有的书在内容上本身就包含着不止一个学科的知识，为了更有效、多渠道地向读者提供资料，在分类的卡片目录中就很有必要互见。但是一本回溯性的总目除了起到提供资料的作用之外，还兼有一个登录总账的性质，因此就不希望有互见，特别是不希望有大量的互见。我们在制片、分类的过程中是使用了互见号的，到汇编时就必须判定主次，将次要内容在提要项中提及一笔之外，尽量不再作互见了。在语言和文学两类中出现的中外文对照的书籍，既可作为学习外语之用，也可视之为附有原文的译文。前者是绝大多数，后者只是个别的，所以我们就将之集中在语言文字类下。在外国文学作品类里的相关标题之下，必要时可加注指引性的题注，使之既集中了资料，也方便于检索。

第三是分类汇编中集中与分散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日常的分类工作中是经常遇到的，而且涉及的面很广，这里所介绍的只是在汇编工作中已经遇上的收书数量比较大的几类。

在《总目》里决定采取集中反映的有：儿童读物、课本和三套大丛书。

按原来的汇编，儿童读物中有一部分集中在儿童文学类，其余均按其实际内容各入其类。这二者之间的界限是较难划清的。此外，散见在各类的儿童读物如与一般读物混在一起汇编也往往会产生具体困难。有鉴于以上两个原因，所以决定将文学类中的儿童文学与散见在各类的儿童读物集中起来，合编一个儿童读物专题目录。

课本既可集中在文化教育类下，也可根据内容散见在各类。我们手上的原始资料，其中课本的集中或分散是不一致的。经商议，决定将中小学课本集中汇编，大专课本则按内容各入其类。集中起来的中小学课本也决定不汇编在文化教育类内，而另编专题目录。因为我们已经收集到的中小学课本资料缺漏的太多，以北图与上图之所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收藏课本比较齐全的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单位入手并相互补充之后才能进入汇编阶段。我们打算为了补齐课本而耽误了文化教育类的及时汇编出版，所以将课本独立出来成为专题，待《总目》的分类部份编齐之后再编。

丛书是仅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这三套大丛书。《总目》中对其他所有的大小各种丛书都是采取按每种单书的实际内容各入其类的，按理对这三套大丛书也应作相同的处理。但是这三套书也有它的特殊性。《四部丛刊》、《四部备要》主要是以线装形式出版的，后来才以缩印本的形式出过平装本和精装本。《丛书集成》只出过平装本。这三部书在当初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出版、发行的，之后只有极个别的作过另本出售，所以在我们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中，属于这三套

丛书的本子大多是从整套书中失散出来的，为数不多。我们决定只将这三套丛书集中在综合性图书类下，但是要详列子目。当然，在我们作决定时也考虑到了汇编工作的工作量问题。这三套丛书的内容都属于古籍重印，将这些子目用四库分类的体系来分类还比较容易，而统一用《中图法》分类，将之散入各有关类，其难度是比较大的。

以上三类图书的特殊处理，使一部书目中并存着两个不同的体系，而且两者之间又没有互见的联系，这当然是一种不足之处。但是从专业读者查阅的角度来看，反而会有些方便，从汇编的角度出发也能节省出不少人力和时间。

(四)关于内容提要问题

一本书目如果能附所收图书的内容提要，会受读者欢迎的，但是对汇编者来说其工作量的增加也很可观，而且在工作中产生出许多具体困难。《总目》是要附内容提要的，但并不要求对每一种书都注有提要，从对提要的实际需要出发，有所侧重。文史哲方面的图书列为重点，要求注得详一些，加注种数的比例也可以大一些，政经法等几个类就可以相对少一些，科技类则除了少数尚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作之外，基本上可以不加注。

关于提要方面的工作，归纳起来大致有这样几个问题。首先是提要本身的简繁问题，我们要求尽量简短，虽然不作具体的字数限制，但一般不超过百十来字，个别有特殊需要则可以超出。其次是不需要对每一种书都加注提要，即使在文史哲这几个类内也如此。凡是书名能概括和说明该书内容，而该书本身的实际内容比较一般，就可以不加注提要；

凡系古籍重印的出版物，提要的重点是对这次出版时编辑、加工等方面的介绍，而不在古籍本身；凡是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其故事情节都不在提要之内。第三是提要本身的措词问题。这是指对过去如此五花八门的出版物是否要用现在的观点作评价性的按语。限于我们的实际水平，用当前的观点来逐一判定过去如此浩繁的图书，是不可能的。但是也不能采取另一极端，一切只作纯客观的反映。经过一段实际的工作之后大致规定了以下三点：一、不作贴标签性的按语；二、尽量少用褒贬性的词句；三、对某些完全站在敌对立场对我们进行歪曲、污蔑，但是书名又起得比较隐晦的，则要在提要中加以点明。

(五)关于索引问题

一本完善的书目，附编有索引是不可缺少的。《总目》计划将索引工作分作两步走，即每一分册编附一个书名索引，等到各分册和补编出齐之后再另行编印一册总索引，分为书名索引和著译者索引两部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再附编一些其他专题索引和附录，如丛书一览表、出版者一览表等。除原著者索引以外文字母先后编排外，其余的均采用以汉语拼音音节顺序编排，另外还编附一个索引条目首字的笔画检索表，有利于一部分不熟悉拼音检索的读者使用。

☆ ☆ ☆ ☆

《总目》的编辑工作已进行快五年了，如果连同六十年代初的两年半，那时间就更久了。至今为止只有“语言文字”“外国文学”两类已初步定稿，整个进度是不够理想的。对编辑这样的大型书目我们缺乏经验，在摸索的进程中也缺少系统、科学的总结，希望大家多多为之提出意见。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

展览工作总结

刘一平 执笔

根据中央书记处1982年6月10日会议通过的《中宣部关于筹备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的报告》，北京图书馆与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中央档案馆联合举办《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经过三单位协商决定，北京图书馆负责收集资料，征集展品，陈列布置等工作；展览的前言、结束语及各章的说明文字由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负责撰写，展品说明由北京图书馆负责撰写；有关的中央文件及档案材料由中央档案馆提供。

北京图书馆马列著作研究室自1982年9月开始了筹备工作。由于马列著作研究室已经做过普查工作，掌握了大量资料，因此核对资料、征集展品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通过当面商借与馆际互借的方式与北京、上海、浙江、湖北、广东、四川、天津等二十多个单位联系借到了图书、资料、文物等展品400余件，约占全部展品的35%，其余65%的展品均由北京图书馆提供。1982年12月底完成了展览大纲草目的整理撰写工作（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参加了讨论定稿）。1983年1月中旬，由我馆马列著作研究室和群众工作

组的十余名同志组成了展览工作小组进驻革命博物馆，开始了陈列布置工作。书展于3月7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同志审查通过。3月14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同志剪彩正式展出，至5月31日结束，历时两个半月。

书展采用密封式大型文物柜24个，斜面柜12个，展线全长为62米。展品以实物为主，共计1442件，其中各种马恩著作中译文版本1342件，有关文件、文物、照片、图表99件，分三部分陈列。第一部分介绍了十九世纪末到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情况。这里展出了一大批现在已经罕见的、最初在我国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献资料，例如目前查到的最早传入中国的马克思画像；最早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名字的《大同学》（英国社会学家器德的著作，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蔡尔康笔述——编注）以及一些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中文书刊；还展出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中译本，该书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初版，9月再版。这一部分还展出了十月革命以后，反映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书刊，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晨报副刊》、《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检厅日录》等。

第二部分主要展出中国共产党诞生至新中国建立期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各种中文译本及其有关的历史文献和文物。这部分展品十分丰富，按党史四个时期陈列。展出了党中央关于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许多重要文件及决议。展出了建党初期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翻译出版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早中译本和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旅法支部在巴黎创办的《少年》杂志第9号原件。展出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许多主要著作，如：华岗译的《共产党宣言》，陈启修、吴半农、潘冬舟、王慎明和侯外庐等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多种译本，以及吴黎平译的《反杜林论》，许德珩译的《哲学之贫困》，李一氓译的《马克思论文选译》等中译本；还有在白色恐怖下出版的伪装本，战争年代便于携带的切短本和苏区出版的《马恩丛书》十种，在国统区进步出版社出版的一大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展出了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的“干部必读”十二种和各解放区翻印出版的大量马克思恩格斯著作。

第三部分展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3年2月在党中央正确领导和亲切关怀下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本，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50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和各种单行本，以及蒙、藏、朝、维、哈等民族语文版和盲文版。还展出了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出版的部分新书新刊。

为了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特展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收藏和阅读过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这些珍贵文物是我们党及其领导人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历史见证。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规模之大，资料之丰富，版本之齐全，是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书展以珍贵翔实的史料再现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传播的艰难历程，真实地记录了我党坚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况。因

此它不仅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而且对广大观众也是一次很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书展受到了上级领导同志的好评和宣传部门的重视。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在3月2日和3月15日对书展的筹备及开幕式情况先后发了消息，全国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光明日报》于2月26日在头版以“北京图书馆研究人员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获重要发现”为题做了专题报道。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节目、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分别在3月7日与3月10日对书展的筹备及有关资料做了介绍。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于3月14日播放了开幕式的盛况，《文化与生活》节目播放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的专题节目，其中近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在书展现场拍摄的。此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于3月2日和15日先后广播了有关书展的通讯消息。国际广播电台三次来书展现场采访，对苏联听众广播了题为“历史的再现、真实的记录”的通讯，介绍了书展情况。《北京周报》以五种外国文字向国外读者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文，我们协助他们拍摄了书影照片。

书展展出后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室的一名编辑同志看完展览后说：你们把这么多宝贵的资料收集起来真不容易，我看了以后很兴奋。许多观众反映：你们做了一件很有益的工作。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顾锦屏同志一再强调希望把这些资料整理保存下来。军事科学院还专门到书展现场拍摄了电视教学片。哈尔滨师范学院拍摄了书展的全套照片，以供教学参考。北京三十中的同学们在留言本上写道：我们要象马克思那样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努力学习，刻苦锻炼，争取做一个对人类有贡献的人。

总结我们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 统一领导，各方协调得好。

这次书展工作受到了馆领导的重视，鲍振西付馆长亲自主持召开了馆内有关部门的协调会议，因此工作中得到了阅览部、第二阅览部、善本部、行政处等部门的大力支持。

参考部和阅览部的领导也很重视这次书展工作。参考部一名副主任直接领导和参加了书展的筹备工作，在许多具体业务问题上严格把关。书展工作小组队伍比较精干，其中文字编辑、资料收集保管、版面设计、图表制作、陈列布置、物品采买等工作各有专人负责，又能相互协作。同志们顾全大局、做到人尽其责，互相支持，扯皮的现象很少。

(二) 群策群力、政治热情高

在革命博物馆陈列大厅里工作，条件比较差，只是在没有暖气的走廊里搭了一个裱糊桌，做为办公室。任务又比较紧，突击性很强，除了春节加班两天外，平时一忙起来，就谈不上工休和午休了。在这种条件下，同志们能做到工作第一，克服生活上，工作中的各种困难，保证了书展的如期展出。为了妥善保管善本书籍和珍贵文物，文物柜要每天装卸柜门，上锁，这是一项很重的体力活，但大家主动承担，从无怨言。有的同志经常带病坚持工作，有时还把工作带回去加夜班做，工作认真负责，给青年人做出了好样子。在工作中，同志们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政治热情。

(三) 发扬五讲四美好风气，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了帮助各地搞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活动，我们毫无保留地把筹备工作的指导思想、展览计划，收集的资料介绍给来访的各地图书馆同志，还主动为上海、浙江、吉